

■热 点

浙江新生代儿童文学作家群:

他们的队伍浩浩荡荡

□行 超

浙江是中国文学的一块高地。鲁迅、周作人、茅盾、巴金、徐志摩……这些赫赫有名的文学大家,都曾在这里受到精神上的启迪与感染。在儿童文学领域中,近年来,以汤汤、毛芦芦、赵海虹等为代表的浙江新生代儿童文学作家群悄然崛起,显示了浙江儿童文学的新风貌。近日,在浙江金华召开的“中国梦·梦驻童心——浙江新生代儿童文学作家群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围绕他们的创作展开了讨论。

正如高洪波在会上所说,儿时受到过儿童文学浸染的孩子,成人之后在面对各种竞争时会有有一种特殊的心态。他与在场作家、学者们分享了严文井、金近和冰心的三个生活故事,提出儿童文学创作要葆有童心、爱心,同时也要有个人的坚持和底线。青年作家应该重视作品所呈现的价值观,更要重视“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个人品行和操守。此外,高洪波还提到,儿童文学作家要站在孩子的角度看世界,与儿童换位思考。在当下,力戒浮躁,精心打造作品是作家们应该面对的首要问题。

发扬传统 不忘创新

鲁迅曾说过,儿童“十余年后,皆为成人,一国励衰,有系于此”。在新文化运动中,鲁迅、周作人兄弟曾多次提出,要发现儿童、关注儿童、尊重儿童,要给孩子们提供好的精神食粮;周作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曾大量收集童谣、童话,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茅盾最早是从编辑儿童读物开始,一步步踏入文坛;朱自清曾以文学研究会的名义,推动和推广儿童文学,发现了不少优秀的青年儿童文学作家……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浙江作家为儿童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也为浙江儿童文学留下了宝贵精神遗产。

刚刚度过自己90岁生日的蒋风先生认为,浙江儿童文学能够一代代传承、发展下来,与其深厚的“传帮带”历史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介绍到,浙江作协儿童文学年会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没有停止过。这个“年会”最早叫“作品加工会”,通过作家之间以及作家与编辑、作家与读者的相互讨论、分享来提高文学创作的质量。在今天,这一传统依旧在年轻作者之间延续着。在一次创作讨论会上,毛芦芦的作品被批评得“千疮百孔”,但她却说,如果想要在创作上有所突破,这样的研讨会“功不可没”。目前有少数作家成名后出版商牵着鼻子走,创作趋于类型化、商业化,不断重复自己,汤汤的坚持体现了创新精神对儿童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

徐可在阅读中对汤汤的“鬼童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认为,汤汤的作品想象力奇特、大胆、丰富,无论是早期童话系列还是后来的小说,都彰显了一个优秀儿童文学作家的想象力。他还深入分析了“鬼童话”的特殊意义:中国有着悠久的鬼文化传统,有许多关于鬼怪的神秘民间故事、志怪小说等。同时,中国人对鬼的态度是极其矛盾的,一方面,人们对那个未知的神秘之物充满好奇,另一方面又难免心生恐惧。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学中,虽然也有把鬼写得可爱的,但大部分鬼的形象还是可怕的。汤汤的童话颠覆了传统文学中鬼的形象,在她笔下,鬼是可爱、单纯、善良、忧伤、诗意的,它们渴望与人交流、沟通,希望能与孩子们相处,这样的形象无疑是适合

儿童阅读的。汤汤的作品充满爱心,比如《烟·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安徒生的名作《海的女儿》,这种文字中的干净、温暖,是儿童文学写作中非常可贵的品质。

多元化的创作方向

在继承前辈作家珍贵文学遗产的基础上,当前浙江儿童文学的创作呈现出各方面均衡发展势头,除了儿童戏剧之外,浙江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几乎涵盖了儿童文学体裁的各个方面和门类,比如,汤汤的小说、童话,慈琪的儿童诗,毛芦芦的散文等等,都在全国儿童文学领域产生了不小的反响。

刘绪源全面评价了浙江新生代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他认为,汤汤的童话充满了现实的层次感,她的创作并不是照搬现实,而是把自身的审美感应与现实相对接。因此,其作品所带来的感动常常与现实相关;毛芦芦的小说有时会显得不够完整,但她的散文既真实又生动,是非常好的儿童散文样本。他由此建议,毛芦芦也许应该走沈从文、汪曾祺的路子,扬长避短,更多地创作偏散文化的小小说;赵海虹的科幻小说具有“元气淋漓的惊异感”,站在了目前儿童文学创作的前沿;常立早期的作品偏“玄”,现在渐渐“绕”出来了,说明他在写作中逐渐找到了路标;小河丁丁的作品常常取材于老旧的、传奇性的民间题材,同时将自己的个人经历和体验融入其中,将少年人的现代价值观与民间故事中的传统价值观结合在一起,呈现出复杂、深刻、完整的深层意义,如《鲁班经》《爱喝糊粮酒的倔老头》就是这种特色的代表;慈琪的儿童诗充满童趣,她的早期作品是本色出演、本心袒露,但现在,年龄渐长的她正面临一个重要的转变,今后的创作该如何向年龄比较大的儿童倾斜,是她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正如鲁迅先生多年前告诉我们的,儿童文学创作的首要意义是培养、唤醒与满足儿童对文学的兴趣。任何时期、任何作家的儿童文学创作,都必须建立在洞悉这一要义的基础上。孙建江认为,新世纪以来,浙江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呈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和自觉的童年意识,作家们懂得浅显与深刻之间的关系,作品中很少伪儿童、假大人的形象。同时,他们敢于探索,勇于开拓,每个人都有自己追求的方向,不管是赵海虹女性视角下的“软科幻”还是汤汤“鬼童话”中传递的孤独感,抑或是毛芦芦与故乡同息同泣的大地情怀,都是作家们在不事声张、低调稳重中相互鼓励、相互扶持的成果。浙江作家深谙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道理,他们不走捷径,坦诚直言,彼此独立,始终坚持自己的文学艺术见解。

陆梅结合自己的写作经验告诉青年作家,一定要注重自己独特的声音。只有在不断的写作中才能知道自己的来路,只有看清来路,才能真正建立自己的坐标——这一坐标当中应该包含写作者自身清醒的历史意识和基本的世界观。在当下,走出写作的自我惯性,不被惯性牵着走,坚持有难度的写作显得尤为重要。

坚守儿童文学的真诚与单纯

近年来,儿童文学发展迅速,从市场占有率、读者接受度等角度来看,都呈现出“黄金十年”的发展态势。正如海飞所说,“黄金十年”表现在儿童文学创作上,涌现出了一批优秀作家、优秀作品,涌现出了一批品牌作家、品牌作品,涌现出

了一批畅销书作家和畅销书。表现在出版上,童书出版从原来的专业出版演化为大家出版,全国581家出版社,有520多家出版童书,年出版童书4万多种,总量世界第一,是整个出版界最具活力、最具潜力、发展最快、竞争最激烈的出版板块,成为带动并提升中国出版业发展的“领涨力量”。“黄金十年”是我国童书出版大国崛起的10年,是我国儿童文学大国崛起的10年。他认为,未来10年,中国童书出版会从数量、规模增长型向质量、效益增长型方向发展。

但同时,方卫平等专家在会上也提出“儿童文学的高度在哪里?”这一问题。他认为,近年来,儿童文学作家成为了时代的宠儿,但也造成了准入门槛低、被市场和数字绑架等问题,儿童文学写作应有的寂寞和专一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一些作家失去了对写作的敬畏之心,这应该引起大家的警醒。

张之路高度肯定了浙江儿童文学作家、编辑之间的互动和切磋。以往有很多优秀儿童文学作品是适合青少年阅读的,对他们的成长有启迪意义;而现在,大多数儿童文学作品都是写给幼儿园的孩子看的。他还与作家们分享了严歌苓等作家的写作经验,认为可以在个人生活经历之外,通过采访、考察等方式深入到更多人的生活中去,从而扩展个人写作的领域,改变目前儿童文学创作格局小、题材少的问题。

儿童文学作品同质化的问题引起了张国龙的关注。他认为,目前儿童文学作家对于“中间地带”的漠视,是急需改变的问题。儿童文学除了表现正面、批评反面,还有更广阔的中间地带,对于这一领域的书写,应该是今后作家们努力的方向。他说,书写中间地带不是用谎言虚构一个童话世界,而是让孩子们认识到,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唇齿相依,从而打开他们认识世界与人生的窗口。比如张之路的《少年刘大公的烦恼》、林海音的《城南旧事》等都写出了人性的复杂和幽微,显示了儿童文学应该表现的“单纯的深刻”。

刘颖从王路的小小说《嬗变》出发,深入探讨了少年成长小小说书写的可能性。她谈到,目前的儿童文学作品中,对于高中毕业生这一群体的书写非常少。事实上,这一阶段的孩子面临着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成长和变化,应该是少年成长小说必须面对的重要主题。王路的《嬗变》重点描写的就是这一阶段孩子们的经历和心态变化。她认为,小说中有着两种叙事腔调:一种是属于成长期少年的、粗粝的腔调,另一种是像儿童文学的、流畅乖巧的“初中好学生”腔调,这种为了像儿童文学而使用的腔调是王路及许多儿童文学作家在今后创作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会议最后,毛芦芦、小河丁丁、王路、金杨、常立、赵海虹、汤汤、孙昱、吴新星、吴洲星、慈琪等作家与大家进行了互动和对话。汤汤代表与会作家与大家分享了个人的创作心得。她说,作品是写作者的尊严,现在,儿童文学作家应该写慢一点,心静一点,淡泊一点,勤奋一点。为孩子讲好故事并不容易,能够讲得出直抵心灵的故事则更难,作家要抱着用一辈子来写作的心态,细水长流,从容些、平和些,多一点思考和沉淀。



很多年前的一天,夕阳西下的黄昏,一个长胳膊长腿的瘦高女孩蜷坐在老屋的门槛上。她穿着毛蓝长裤、花洋布小褂,额前的刘海整齐而又浓密。她拱起的膝盖上摊着一本厚厚的书,是那个年代风靡全国的长篇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因为夕阳斜照的关系,她的眼睛微微地眯缝着,皮肤也是微黄的,隐隐地现着一种菜色。那正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毫无疑问,女孩也是营养不良的人群中的一个。

在那个黄昏,她老家的姨娘风尘仆仆地从长途汽车站出来,一路打听找到了她的家门。姨娘的身影遮住了女孩眼前光线的刹那,女孩迷朦地抬起头来,竟没有丝毫的惊讶和惊喜,把膝盖上的书页合上,让姨娘看清封面,然后问出一句话:“你看过这本书吗?”

这个蜷坐在门槛上的女孩就是我。那年我7岁,读小学二年级。

我长大后,姨娘不止一次地提到这件趣事。姨娘笑我是书痴,见了老家亲戚不知道起身问好,反倒魔怔地举着一本书问她看过没。姨娘由此断定我不是个聪明伶俐的孩子。

的确如此。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我依然是一个不善交往、每到公开场合便感觉拘谨和蠢笨的人。书本让我的精神世界变得极其丰富,相对而言,物质的世界便不再重要,它可以远远退居其后,它的喧闹和嘈杂跟我没有太多的关系。

我11岁那年,“文革”开始。“文革”剥夺了我们那一代人读书的权利,然而对于文字的渴望却像野火烧过春风中又生的草地一样,蓬蓬勃勃不可遏止。我的父母都是中学老师,我家书架上仅有的百十本书,短时间内被我如饥似渴却又囫圇吞枣地读了个遍。记得那书架上最齐全的一套书是初一到高三的语文课本,借助于课文后面的详细注释,我似懂非懂地读完了整个中学时代必须阅读的古代文选,至今还能够记得起其中的某些篇章。有几册《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是我最感兴趣的课本,因为它们,我清楚地意识到世界不仅仅是我生活的这个小城,它要广阔得多神奇得多也丰富得多,值得我们穷尽一生的努力去追寻和探索。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着了魔一样地渴望当个地质师或是间谍,便是因为这两种职业背后的广阔背景和不可知的神秘。童年的阅读对人的一生影响至深。

我父母工作的学校是一家很不错的县中学,县中图书馆在我童年的心目中曾经是一处圣殿一样的地方。“文革”开始的那一年,圣殿被打碎了,成千上万册图书被搬出来示众,然后拖到操场上一把火烧毁。图书馆主任火中抢栗,偷偷运回家一纸书藉。主任的儿子跟我小学同班,因此我沾了他的光,我们像老鼠偷鸡蛋一样,把箱子里的小说一本一本地搬运出来,在一双双黝黑的小手中辗转一圈之后,再神不知鬼不觉地放回箱子中去。那个图书馆主任可能比较“崇洋媚外”,弄回家的小说大都是世界名著,我对于外国文学的兴趣,便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记忆特别清晰的是一本日本小说,书名叫《到泉水去的道路》,作者是谁不知道。那时候读书,总是看一眼书名,直接地、迫不及待地进入正文,享受大餐,而那个大餐的烹饪者完全在我心里忽略不计了。我还记得小说主人公叫京子,是个活泼开朗颇具现代意识的16岁女孩,京子的母亲寡居,年轻漂亮,渴望爱情,母女相依为命。我印象最深刻的细节,是母亲教女儿如何梳妆:要把额前的头发擦上去,突出那个部位的光泽明朗,才能衬得少女面孔青春勃发。这个细节之所以印象深刻,大概因为自己也是个爱美的女孩,而那个时代却无从美起的缘故吧?

还记得一本书名,叫《漂来的磨坊》。记住它是因为觉得书名奇怪:磨坊不应该是一座建在地面上的房子吗?房子怎么可以“漂来”呢?至于这本书的内容写了些什么,我已经忘得精光。依稀记得里面写到了爱情。我之前一直以为这是法国女作家乔治·桑的一本小说,最近又读到关于乔治·艾略特的一段传记,提到她曾写过一本《弗洛斯特河上的磨坊》,倒觉得像是我读过的那本,译名不同而已。两位女作家,名字都带“乔治”,少年时代的我便搞混了。

小孩子看书不知道爱惜,再加上那时候生活粗鄙,该有的教养全都没有,一本书在我们手中经过无数地传阅后,总是污秽不堪。基本的格局是这样:书角蜷曲,书页薄脆如蝴蝶翅膀,吹弹即破,而且霉变黄黑,气味难闻。封面扉面统统没有,因而不知书名,更不知作者译者。前十多页一般只剩1/3大小,再10多页有了1/2,之后是2/3,最后是完整页面,呈阶梯形状。缺损的情节内容,要靠残页猜测才能建构起大致框架。好处是,读书的过程也是我们随心创作的过程,如我这般痴迷者,狼吞虎咽读了残书,倒阴差阳错地训练出了猜测情节人物的能力,多年之后,成为我自己写作的基本功。及至10年之后我上了大学,外国文学开禁,我在北大图书馆发疯一样地狂读名著时,往往读过开头10多页,就会在心里惊叫一声:这不是我小时候读过的吗?然后我深深地埋下头去,额头紧贴着书页,嗅着那股陈年纸张散发出来的潮湿的气味,心里涌出一阵老朋友失而复得的狂喜。更有一些书,童年时候莫名其妙地读过了,模模糊糊留下一点印象,成年之后想找到它复读,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比如那本《到泉水去的道路》,比如《漂来的磨坊》。它们就这样永远地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像无数消失在在我生命旅程中的朋友和家人。消失和永存,人的一辈子便是这样一点点地积累起来,积成一条蜿蜒在身后的长长的印痕。

10年“文革”,所幸有温暖的文学作品和我相伴,我没有堕落也没有荒废。我要感谢我同学的父亲,那个平凡的图书管理员。我也要感谢当年那些肯与我分享书籍的小伙伴们。他们是我生命中的光,在长夜暗行中遥遥地指引方向。



□黄蓓佳

黑暗时代的光亮



儿子很懂事儿,每次都是连夜班飞机回英国读书,这样机票可以便宜不少。由于中途需要转机,所以每次的航程都要花上20多个小时。我和妻子老是对他说:“还是买直飞的机票吧,少受点儿罪。”可儿子没有一次照办。

我想以他认为,家里送自己出国深造,已经承受了很大经济压力,所以能省则省吧。

记得去年6月,他第一次回国,我和妻子到机场接他,由于飞机晚点,等了好久才在出口看到了儿子的身影。还是那件穿了三四年的黑风衣,还是走时穿的那双高帮大头鞋,头发长得披在了肩头。这身装束与初复京城人的打扮形成了鲜明对比。

妻子心疼地挽着儿子的手,问他吃饭了没有。儿子摇摇头,粗声粗气地答道:“原想在赫尔辛基转机时吃点儿东西,可一看价格,就没了食欲。飞机上的饭倒是吃了,可不怎么顶事儿啊。”看着儿子憨憨的笑脸,我的视线模糊了。二话没说,我加大油门儿直奔儿子喜欢的这家餐馆。看着儿子狼吞虎咽的模样,自己的心情可谓是五味杂陈,说不出是欢喜还是难过,反正酸楚和欣慰就那么交织在一起。

回到家里儿子倒头就睡了,看来实在是累坏了。妻子整理着儿子换下来的衣服。那件黑色的风衣已经洗得发了白,下摆处不知何时刮了个口子,已经用深蓝色的线缝补好了,只是手工看起来还很蹩脚。

“你抽时间带儿子去买件新的吧,我看这件也该退伍了。”“成!”我和妻子轻声地交流着。

可儿子回英国时,穿的还是那件黑风衣,只是让裁缝把破损处重新修整了。我埋怨妻子为什么不给他买件新的。

“你儿子不要啊!他说到国外自己去买。”妻子委屈地说。

儿子今年回国,穿的还是那件黑风衣,瞧上去更旧了。看着与他同机的那些时尚光鲜的少年们,我不禁由衷地佩服起了儿子,因为在一群华服少年中,身着旧衣是需要点儿自信和勇气的。

每当聊起在国外的生活,儿子总是摆出一副轻松的样子,我和妻子明白这是在安慰我们,不让我们担心。谈起一日三餐,他说除了三明治和汉堡,还会时不时地煮碗面犒劳自己。我们询问他具体做法,儿子就绘声绘色地讲了一段煮面条儿的段子:

儿 子

“那天快餐实在是吃腻味了,我就狠心去超市买了个小锅,又买了点儿面条儿、绿叶儿菜和酱油。我先把面条儿煮熟了,再把菜撕碎了放进去,出锅时倒点儿酱油调味儿,就ok啦。要是饿了,我就去买点儿羊肉片儿,和面一起煮,倍儿香!”

看着儿子眉飞色舞的神情,我和妻子慢慢地都放了心。有时也会聊起留学生们的购物趣事。儿子说空闲时会陪同学逛街,任务是用英文和店主砍价。他说同学们在享受花钱的快乐,而他则喜欢看同学们付账时奢侈品店店员的神情。用儿子的话说:“瞧他们吃惊的样子,感觉倍儿爽!”

儿子每次回来都会给爷爷、奶奶、姥爷、姥姥带点小礼物。看着他小心翼翼地取出包装精美的小盒子,嘴里念叨着:“这可是我两个星期的饭钱啊。”我和妻子都欣慰地笑了。

相较国内大学生的学习轻松,在国外求学的日子就没那么好混了。每次询问儿子的情况,回复最多的字儿就是“忙”和“累”。收到这样的回复,我和妻子的心情是复杂的:既担心孩子的身体,又为儿子没有荒废时光而庆幸。

记得有一次聊起国外老师的评分标准,儿子不断地抱怨着老师的严厉和苛刻。据他讲,在他就读的学校,单科成绩能得到65分以上是很难的,而此次老师给了他70分。

“难得啊!这次是赶上老威廉开恩。”

听得出儿子的调侃里有着丝丝得意。这让我和妻子满心欢喜,对儿子成绩背后的付出,我俩心知肚明。

时光真是如梭,一转眼儿子就大了,昨天的青涩少年已经变成身材高挑魁梧的青年了。我和妻子需要仰视才能看到他的面颊,这种踏实的感觉让我们的内心感到充盈。

一个夏日的傍晚,我和儿子沿着小区里的水系缓缓地散着步。儿子突然对我说:“老爸,您还记得教我踢球的事儿吗?您教我的那几招儿还真顶事儿,有一回我比画了几脚,居然把几个英国同学给镇了。”

我在记忆里努力寻找着,终于想起来了!

儿子说的那件事儿,还要追溯到他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这也是我惟一一次陪他单独玩耍。可仅有的这一次,却深深地留在儿子心里,成为了他无比珍贵的记忆和幸福。

这些年我都他妈的忙什么呢?20多年了,我居然只陪儿子踢过一次球。我真想抽自己的嘴巴。



“唉!儿子,这些年老爸和你在一块儿的时间太少了。”

“我知道您忙。看您累了一天,我也不想再去烦您,我擅长自娱自乐。”

儿子是在给我吃宽心丸儿。可我却想,这一生已经再也没有机会去陪伴儿子的童年了,即使你能找出一万种理由,可这种自责会一直伴着自己余生。

儿子又乘“红眼儿”飞机去了万里之遥的异乡,继续他清汤面的求学生活。推开儿子的房门,看着收拾得整洁的桌面和床铺,我又一次真切感受到了儿子的成长。我靠在儿子的床头,隐隐地可以嗅到男孩子专属的青春味道,感觉到其中的阳光、刚健和无畏。

“儿子,你已经长大了。天够高,地也够大,足够你去驰骋。老爸只是想再嘱咐你一句,别成天价老吃清汤面。”

缪惟 文/图